

# “身体诸觉”的在场： 中国文学对城市的审美

刘玉平 周晓琳

**摘要：**人类对于环境的审美维度具有多样性，知觉系统便是其中之一，正是由于“身体诸觉”的在场，中国文学城市审美才充满了丰富的质感。自汉代始，视觉感受和听觉感受便成为中国文学家体认和表现城市之美的重要依据，而主体身体诸觉快感生发的关键原因则在于城市形象丰富的审美蕴含。具体言之，中国文学家环境感知中的审美愉悦关联着中国城市设计和建设所遵循的诸多美学原则，同时，还源于主体自身多重生命需求不同程度的满足。

**关键词：**身体诸觉；中国文学；城市审美

受高度发达的农业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城市审美问题长期未能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古典诗学与古典美学的诸多重要范畴，无论“情景交融”的意境说，“江山之助”的灵感说，抑或“文如其人”的作家论，“阴阳刚柔”的风格论，无一例外地将城市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出版《美学散步》，广泛地讨论了中国古典音乐、绘画、书法、诗歌、小说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及其审美价值，城市审美问题依然“缺席”，宗白华先生的研究视角及其美学观念无疑代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主流。

城市审美研究的长期缺失并不意味着城市审美实践活动的根本性缺失，一个标志性的表现是，自汉代始，中国文学家就围绕城市不断进行丰富多彩的艺术描写，通过生动具体且富有现场感的形象传达出他们对城市之美的独特感知与价值体认。尽管城市审美与乡村审美的对象迥异，但同为审美性地反思人类栖居，主体对于客体之美的感知与欣赏必然遵循相通的规律。进入审美视阈的城市如同乡村一样，从来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经验着的环境，人类的经验作为一种知觉系统，从审美的立场审视，“它具有感觉的丰富性、直接性和即刻性”<sup>①</sup>。由于知觉是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的整体在头脑中的反映，因此，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甚至味觉所获得的各种信息，都可能被积极地包孕在环境经验之中。审美体验最终体现为一种超越肉体快感的主体精神愉悦和心灵慰藉，所以，强调审美愉悦至关重要的远距离静观非常必要，然而，我们在讨论环境感知时如果强行分裂或一味排斥感官作用，则走向了极端。人类审美实践证明，因主体生理机能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感官快乐，在美感构成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人

类对于环境的审美维度具有多样性，知觉系统便是其中之一，诚如乔治·桑塔耶那所说，“人体一切机能都对美感有贡献”<sup>②</sup>，正是因为“身体诸觉”的在场，中国文学城市审美才充满了丰富的质感。

## 一 “身体诸觉”在场与城市之美的文学呈现

出现于中国文学的城市形象，具有五大显著的审美风貌，即融入自然的和谐之美，内蕴外化的技术之美，彰显文明的动态之美，各具特色的个性之美以及多元共生的复合之美。中国文学家对于城市之美的最初体验与艺术表现全然不是出于先在的观念和理性的认知，而是基于自身的经验。作为人类后起的居住场所，城市在物质构成、景观呈现、居民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社会职能作用诸多方面，与乡村存在着本质差异，城市美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亦因此而定。对于那些刚刚走出世代居住的乡村生活场景而进入城市的个体而言，情感的不适或激变首先源于强烈的感官刺激，这一点，我们从茅盾《子夜》描写乡村土豪吴老太爷面对大上海夜间声色光电而产生巨大恐惧感的情节中不难认识到。城市经验既可构成反观乡村的独特视角，亦可成为审美愉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家之所以擅长采用“鸟瞰”的态势去捕捉和展现城市之美，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城市外在的形色声光给予他们的第一印象。汉代都邑赋是最早出现的城市文学典范之作，创立“京都大赋”一体的班固，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展开艺术想象，创作了影响深远的《两都赋》。他运用铺张扬厉的手法渲染汉代长安、洛阳两都的形势、布局及其气象，形象地再现了盛世京城的壮美与繁荣，其艺术构想主要是通过视觉形象完成的，以下是其中最典型的一段：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闾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sup>③</sup>

以视觉感官切入，抒写心随目动的愉悦以及发自内心的赞叹，这一手法被后世文学家所继承，赋家如此，诗人亦如此。唐代李世民的《帝京篇》（其一），王勃的《临高台》、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传世名篇，相继采取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长安的山川形胜、城阙宫殿、王侯府邸、衣冠文物、车马饮饩、各色人物，被诗人尽收眼底。作品极力渲染帝都宫室之壮美、景象之繁华、风气之奢侈、人物之纷杂，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凭借壮阔的都市长卷，强国帝都的旷世风貌，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以及文学家“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博大胸怀，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美就在这样的描写和观照中展开。

视觉，被乔治·桑塔耶那定义为“最卓越的知觉”，因为“只有通过视觉器官和依照于视觉，我们才最容易明白事物”<sup>④</sup>。中国现当代文学家的相关创作，再次确证了视觉在城市审美中的不可或缺性。斗转星移，时代变迁，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赋予城市日新月异的面貌，面对变动不居、历久弥新的审美对象，视觉感知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感受永远是文学家表现与评判的重要依据。1924年，鲁迅应西北大学的讲学邀请前往西安，同行者中有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原，孙后来在《杨贵妃》一文中这样介绍此次西安之旅的情况：

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相当满意……<sup>⑤</sup>

收获首先来自于“看”，一连五个“看”字无疑突出了视觉对于美感生成的重要意义。他谈的虽是个体会，客观上却反映出一种普遍经验。至于文中提到鲁迅对此行不甚满意，只是因为初步的感知偏离了他关于古都的记忆印象。事实上，我们所谓形式美的事物，往往肉眼可视。1963年，身处上海的著名诗人闻捷写下政治抒情诗《我思念北京》，纵情赞美共和国首都。诗人关于北京的想象建立在充分调动知觉系统的基础之上，他通过听觉、触觉、嗅觉尤其是视觉全方位获取有关北京的种种信息，借助北京著名的人文景观如知春亭、西苑、钓鱼台、谐趣园、陶然亭、太和殿、佛香阁、九龙壁、长安街、前门饭店、首都剧场、天安门城楼、历史博物馆，构建起一个集历史与现代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在这里，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国都，不仅是象征的，也是具体的，鲜活可感的。

除了视觉，听觉在人类的环境感知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伯林特将除自然之声（如风声、雨声）以外的城市声音

归结两大类，一类是人声，例如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孩子的玩耍声、父母的呼叫声、人们断续的谈话声以及熙熙攘攘的人流声，这是生活本身具有的声音，“它们表明了鲜活的生活正在进行”。另一类则是各种机器发出的声音，例如汽车的轰鸣声、报时的钟声、报警的笛声、电锯的噪声、喧嚣的喇叭声以及从收音机、电视机发出的声音，“这些刺耳的声音围绕着我们并压倒人声”<sup>⑥</sup>。他认为理想的听觉环境是人与声音的完美结合，美因人的声音而彰显。其实早在宋代，中国文学家关于城市卖花声的描写就形象地诠释了这一道理。

沿街叫卖鲜花，是宋代城市的一大景观，体现了城市经济与城市生活的紧密结合。两宋时期，大城市居民对于鲜花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欣赏热情和消费能力，每年春天花市游人如织，沿街卖花声不断，经过作家的审美观照与艺术提炼，它们由普通的生活场景转化为充满美感的文学图景：

午梦醒来，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王禹偁  
《夜行船·曲水溅裙三月二》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湖边柳色渐啼莺。才听朝马动，一巷卖花声。  
——刘辰翁《临江仙·晓晴》

街头小贩追随春天脚步的卖花声引发了文学家欢快愉悦的审美情感，流动的卖花声形象地传达出城市春天的独特魅力，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城市环境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及市民生活的丰富多彩，也由此得见一斑。

在城市迈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鉴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对机器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强，机器声在市声中所占比例亦随之增加。那些令人心烦、污染环境的嘈杂之声固然与美感无缘，不过，轰鸣的马达声一旦带来旧貌换新颜的都市奇观，赋予主体全新的知觉感受，那么，它就完全可能成为美感的源泉。1931年，诗人番草在《都市巡礼曲》中这样写道：“交通机关的音响与汽笛在旋律着现代的交响乐，电流的空间里梦一般的高耸着那纵横的几何景。”<sup>⑦</sup>当大批作家将畸形繁荣的大都市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地标给予痛心疾首的批判时，他却从城市的声音中捕捉到了美的旋律，其意义即如邦斯多尔夫所言：“当我们反思地观照一个客体或环境和感受一种愉悦时，在充溢着令人惊奇、赞叹、快乐和感恩的因素的地方，一种被我们称之为美的审美价值实现了。”<sup>⑧</sup>对现代城市进行审美观照，完全不可能、也不应该避开机器的声响，只有人声与机器声有机融为一体，方可营造出人与物和谐共生的理想居住环境。读一读闻捷《我思念北京》中的这些诗句：“红领巾的欢笑装满北海的游艇”，“北京悠扬的钟声催动了待发的列车”，“湛蓝的天空飞过频频致敬的银燕，一片彩云托着戴有竹哨的鸽群”，便不难感受到两大类声音和谐相融对于美化城市的重要

意义。

## 二 身体诸觉在场与城市形象的审美意蕴

人对环境的审美维度既包括环境带给人的感官愉悦，更包括环境对人生命的启示及其对主体生存精神需求的满足。作为客体的城市建筑的景深、样式、色彩以及弥漫于城市的各种声音和气味，只有与主体自身先在的审美观念相契合，内化为精神愉悦的源泉，方可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黑格尔认为美感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他将这种介于感觉与思考之间的心理功能命名为“敏感”，借以表明“美感虽直接从感官接受美的信息，但不仅停留于感性处理阶段，而且有‘朦胧’的理性处理参与”<sup>⑧</sup>。由于身体诸觉对美的信息的吸收与理想活动以“概念的朦胧预感”的形式参与审美，已经成为美感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我们的任务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从文学表现的角度去描述知觉系统在城市审美中的存在与作用，更重要的是必须回答理性如何以“朦胧预感”的方式参与审美的问題，换言之，揭示客体引发主体身体诸觉快感的深层次文化意蕴，以彰显感性与理性、身体与心灵的内在联系。下文，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中国文学家环境感知中的审美愉悦关联着中国城市设计和建设所遵循的诸多美学原则。

第一，对称是中华民族普遍推崇的形式美法则之一。对称，是指物体或图形两边的各部分在大小、形状、排列上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对称性普遍存在于宇宙之中，它可以带给人一种稳定、凝重、和谐的审美感受，如果将对称与对比有机结合起来，在相反两极的框架中形成对称，审美效果更加强烈。对称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之一，例如健康动物的形体（包括人体）大都呈现出左右对称的特征。深受整体动态平衡思维方式（亦称辩证思维方式）影响的中华民族，基于对对称法则的深切感受和洞察，无论建筑、园林、街道的设计，抑或诗歌的声律、对偶，都积极地追求对称的效果，而中国文学家对于事物外部形态对称美的敏感与倾心，也正是长期以来以对称作为美观念潜移默化的结果。中国古代的北方民居以及为数众多的城市在设计上或整体或局部地体现出整齐方正、对称平衡的布局特点，例如唐代京城长安的里坊制采用东西对称的格局，东西两市为商贸区，遥相对应。城市整体格局基本符合《周礼·考工记》所描绘的以宫城为轴心，南北中轴线为主导、严整对称的都城空间形态，这一特点给了著名诗人白居易“棋盘”的视觉观感，他在《登观音台望城》诗里这样描绘：“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形象而又准确。当时的长安以朱雀门大街为中轴线，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它们彼此平行又相互交错，将城市比较均匀地分为一百余坊，登高俯瞰，的确能够产生整齐如棋盘的视觉感受。明代的北京城堪称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它采用以宫城为中心的向心格局，以永定门到钟楼长达7.8公里作为城市中轴线，

这种“取中而两分，以中轴建筑为主线而两侧均衡分布的城市格局”<sup>⑨</sup>，给人一种贯通壮阔、平衡对称的视觉美感。明代产生的多篇《北京赋》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艺术表现，兹举二例：

前朝后市之规，既肃肃而严严；左庙右社之制，复亭亭而翼翼。布列有序，不爽寸尺，妙合化工，莫究窥测。——陈敬宗《北京赋》

上仿象夫天体之圆，下效法乎坤德之方。两观对峙以岳立，五门高矗乎昊苍。飞阁岫以奠乎四表，琼楼巍以立于两旁。庙社并列，左右相当。——李时勉《北京赋》

视觉感官的愉悦受制于主体审美心理的预设，明代文学家们之所以高度肯定与热情赞美这样的城市格局，根本原因在于它具体演绎了北京人在对称美法则支配下所形成的以“正”为上、以“中”为美的审美取向。

第二，和谐美是中华民族特别推崇的另一审美法则。“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城市建设理念，因地制宜，背山面水的选址原则之所以得到普遍贯彻，除了能够满足经济实用的现实功利需求之外，城市规划者亲近自然的文化禀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秦时期，儒家“比德山水”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从不同角度沟通了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为奠定中国人审美心理结构的两大理论基石。传统的风水理论则将崇尚自然的文化思想与审美情趣带入城市环境的选择和经营之中，在造就了中国古代城市融入自然的和谐之美的同时，也培养起中华民族以和谐为美的环境审美心理取向，讴歌山水城市意境美的文学传统也在此基础上形成。

汉代辞赋家扬雄《蜀都赋》云“两江饰其市，九桥带其流”，形象地展现了成都依托自然、山水环绕、适宜居住的建筑风貌。唐代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诗将“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和“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两组不同的镜头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成功地传达出帝都长安由山绕水萦的自然形胜与大气磅礴的宫廷建筑共同铸就的独特气质。白居易《洛川晴望赋》采用俯瞰视角描绘洛阳一带的宜人景色，所谓“赋邙山，眺洛邑”，将自然山水景观与城市建筑景观并举，尽情欣赏“三川浩浩以奔流，双阙峨峨而屹立”，“瞻上阳之宫阙兮，胜仙家之福庭。望中岳之林岭兮，似天台之翠屏”的美景。我们注意到，当代文人赋洛阳曰：“伊洛清波，滋天赐邑城；邙山苍柏，壮周立王城”<sup>⑩</sup>，无论观照视角抑或情感反应，与白居易如出一辙。桂林是中国著名的山水城市，自然山水与园林美景交相辉映，从古至今，赢得无数赞歌。宋人陶弼《桂林》诗曰：“青罗江水碧连山，城在山光水色间”，王正功《鹿鸣》诗更是首次吟出“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传世名句。今人何开梓作《桂林赋》云：“斯地也，北以五岭崇峦为屏，南以桂柳运河为襟，东南连苍梧之沃

野,西北以三江为芳邻。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sup>⑩</sup>唱响了新时代的桂林赞歌。千百年来,审美主体对于客体和谐之美的欣赏态度一以贯之,从未改变。

山水景观与城市景观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和谐之美,是一种意蕴深厚,足以唤起人深刻情感体验的高级审美形态,人为之城市建筑与自然之山水风物经过巧妙搭配,营造出别有一番韵味的审美境界,可以同时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一方面人们置身高楼,真切地享受到物质文明发展的成果,身心的快乐必然关联着与个体当下物质欲望的满足,同时,由于高度对象化的城市文明见证着人类奋斗的力量与改造自然的成功,主体从当下直接性的生活状态中体悟到生命创造的实际意义,从而进入到审美的层面。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长期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土壤之中,山水基因参与了大众审美心理的建构,人们即使行走于都市,也渴望自然山水的拥抱与浸润。城市依山傍水而建,二者建构起彼此呼应、衬托和交融的内在联系,直接满足城中人亲近自然山水的审美心理需求。

第三,技术美是城市建设普遍追求的美学效果。美的城市建设布局总是体现着技术和艺术的有机统一,高明的建筑师在成功采用技术手段强化和完善不同类型建筑的实用功能的同时,尽可能地调动各种艺术因素赋予建筑的外在形式美,这便是视觉感官能够参与城市审美活动的关键因素。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审美元素是构成中国古代城市技术美的重要成分,例如殿堂楼阁的“飞甍”,即上翘如飞的屋脊,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优美造型的标志,无数次成为文人墨客审美表现的对象,南朝诗人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赞美金陵城美景:“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盛唐著名诗人王维诗极言长安之美,有“小苑接侯家,飞甍映宫树”(《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之句。“飞甍”造型得益于屋顶构建直线和曲线的巧妙组合,技术层面上达到了收纳阳光、遮蔽烈日、排泄雨水的效果,从审美角度看则增添了建筑外观飞动、轻快、飘逸的美感,堪称民族智慧的结晶。此外,古代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画栋雕梁、回廊曲宇,以及现代城市里大量涌现的各类雕塑,皆如“飞甍”,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和伟大的创造力,故而构成了文学家美感产生的内在基因。

其次,中国文学家环境感知中的审美愉悦还源于主体多重生命需求不同程度的满足。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绝非单一的存在。作为理想的居住地,城市首先必须满足居民群体基本的生活需求与安全需求,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有利于他们实现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较之相对简单、静止的乡村生活,复杂多变、文化功能齐备的城市生活更具备在不同层面上满足居住者生命多样需求的优势。前文提到的丰富多彩的城市声音,之所以能够构成中国文学家感受与把握多元复合的城市之美的主要尺度,主要原因正在于它的文化彰显功能。一个典型的现象便是,古代作家对于京城早朝的津津乐道与倾情描写。京城作为全国政

治文化中心,多元共生的城市特质使它的声音较之一般城市更为繁复,更富于变化,也更多地包孕着生发美感的文化元素。除了梨园教坊的弹唱,街肆商铺的叫卖,酒楼茶肆的吆喝以及通衢大道的轮转,以一种日常生活的形态昭示着个体生存低层次需求的种种满足之外,更有京城早朝庄严的钟声与大气磅礴的礼乐,宣喻着国家主权,象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在催生出无数个体的民族自豪之感与政治向上之情的同时,也使那些参与早朝的文人士大夫因人生理想的初步实现而获得身心的愉悦,其审美价值不言而喻。

人的自我实现是在不断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古老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亦是人自身不断充实、完善的进步过程。不断发展的城市见证人类的不断进步,城市的声音传达城市独特魅力,彰显出人自身改造外部环境的力量与成就,因此,当文学家透过听觉感官感受到城市之间相互区别的文化个性时,与文化认同感同时生发的还有本质力量对象化后的自我满足感。清代的扬州是全国戏曲表演中心,通俗文艺十分发达,市民的娱乐生活丰富多彩,在这座江南名城里,传统的竹西歌配合着民间的俚语歌谣,演奏出一曲雅俗共赏的城市乐章。清代文人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sup>⑪</sup>,通过充满浓郁市井气息的城市之音表达了自己对扬州的具体感受:

听箫馆取吹箫句,大士堂题百子堂。怪底扬州二三月,男人唱歌女烧香。

清客丝弦柁子歌,粉屏门后玉人多。分明曲里新闻事,记得传来是卖婆。

太仓弦子擅东吴,醒木黄杨制作殊。顾汉章书听不厌,《玉蜻蜓》记说尼姑。

《扬州竹枝词》结合充分世俗化的生活情节录入了多样的市声,清晨送丧时的鼓吹,晚回熏轿下的笑言,中秋夜满街的锣鼓,大街上和尚的说法,市场中长腰健妇的尖叫,六一堂前文人墨客的吟诵,声声入耳。尽管《扬州竹枝词》是以批判为基本创作主旨,但董伟业的具体描写仍然令读者真切感受到扬州以俗为美的城市风貌。

通过声音表现城市个性之美,借以彰显城市建设的卓越成就,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延续在当下的城市审美活动中。2007年,《光明日报》开设“百城赋”专栏,面向全国征稿。在其刊载的多篇赋文里,声音成为众多作家揭示城市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要切入点。百城赋的作者大多具有“本地人”身份,他们对所赋城市的感受普遍具有直接性、当下性和丰富性特点,那些被频频提及、集中折射出民间智慧光芒的方言、民歌以及地方戏曲,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点。《苏州赋》云:“昆曲婉转,笛箫依依轻送;吴依软语,琵琶声声相闻。”《柳州赋》云:“喜岭南歌海生潮,壮歌独领风骚。”《滁州赋》曰:“双条鼓,舞出国家文化遗产;《茉莉花》,唱遍全球五洲四洋。”《兰州赋》曰:“太平鼓铿锵威武,兰州曲余音绕梁。”《海口赋》则曰:“海口好艺之邦,土戏风味仍在,琼

剧唱响岛内、岛外。”百城赋的征集及其写作，根本目的在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体现民族精神的强大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因此，上述来自不同城市的方音小调、声腔旋律并非仅仅悦耳才具有审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汇入到了时代的宏大叙事之中，具有连接古今、传承中华文明的功能，从而沟通了感官与心灵的联系，作家从悦耳走向悦心，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之中。

机器声是现代城市区别于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虽然它在一定范围内打破了城市居民原有生活的宁静氛围，却也在改变其生活方式的同时，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故具有被肯定的积极意义。经济学家认为，在国家经济处于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的背景下，“机器轰鸣是最美的乐声”<sup>⑩</sup>，文学家则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表达了同样的认识。深圳是一座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它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在一片小渔村的土地上迅速崛起，作家王成钊这样描写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裂变：“推土机开始轰鸣，正在推倒一堵又一堵阻碍思维裂变的残墙，开始抹掉曾经辉煌的小农经济缩影，把现代商业文明，推进到二十一世纪。”“压路机也开来了，正在来回碾压老树也滋养过的贫困、愚昧、守旧、封闭。”当诗人将终结“城中村”的巨大爆破声视为“一个古老民族迈进现代文明的坚实步履”的见证，并且激情飞扬地预言“在旧观念的废墟上，浸淫着传统美德的现代文明将傲然耸立”<sup>⑪</sup>时，机器声作为现代科技之声的代表，因凝聚了人们不断被激活与释放的正能量而被赋予了崭新的审美内涵。

较之乡村的宁静、稳定，城市之美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的喧闹、变动。就城市审美而言，动态之美既可指城市建筑外部形态的“旧貌换新颜”，如摩天大楼的矗立，城市高架桥的飞起；也可指城市文化景观的推陈出新，甚至亘古未见，如街头的音乐喷泉，居民的节日狂欢。视觉和听觉是人们感受上述变化的重要窗口，当代诗人邵燕祥就是通过声音的转换感受到了北京城的变化，他说：“近几十年，什么是北京的城市之声？50年代的锣鼓，60年代的高音喇叭，70年代，记不清是北京站还是电报大楼，一天几次正点播放‘东方红，太阳升’的旋律。”<sup>⑫</sup>现代城市马达轰鸣，鼓乐喧天，华灯闪烁，吊车运转，种种景象猛烈地冲击着主体在长期的乡村审美和山水审美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构成了对传统审美经验的挑战与超越，不少人一时间感到不适，在所难免。然而，当主体的身体诸觉在外界连续不断的强烈刺激下逐渐产生适应性之后，其审美心理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知觉感受被注入激情的力量，积淀为新的环境审美经验，人的自我实现便得以向前跨越。城市的动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文学家审美视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一位老诗人如此描写他眼中的北京：“何

处秋光好，绝美是京华。红紫百重香透，山水献清嘉。轮奂千霄楼阁，百变图案广场，焰火灿奇霞。”<sup>⑬</sup>融入山水的和谐之美与彰显文明的动态之美，同时成为讴歌的对象，后者使诗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震荡，他的兴奋与激动源于人自我价值的确证，故属于美感体验的范畴。至于城市动态的审美内涵，拙文《城市审美特征的当下思考》<sup>⑭</sup>已有所论述，兹不赘言。

#### 注释：

- ① [美]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刘悦笛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 ②④ [美]乔治·桑塔耶那：《美感》，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第50页。
- ③ 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 ⑤ 孙伏原：《鲁迅先生二三事·〈杨贵妃〉》，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795页。
- ⑥ [美]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张敏、周雨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 ⑦ 香草：《都市巡礼曲》，载《现代文艺》1931年1-2期，第12页。
- ⑧ [美]波林·冯·邦斯多尔夫：《城市的繁荣与建筑艺术》，见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刘悦笛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 ⑨ 曹俊峰等：《西方美学通史》第四卷《德国古典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
- ⑩ 王南：《北京审美文化史》（明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
- ⑪ 谭杰：《洛阳赋》，《光明日报》，2007年12月3日。
- ⑫ 何开粹：《桂林赋》，《光明日报》，2007年8月20日。
- ⑬ [清]董伟业：《扬州竹枝词》，广陵书社2005年版。
- ⑭ 赵士高等：《共和国经济风云（上）》，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 ⑮ 王成钊：《深圳的城市意象》，《散文诗世界》2005年第5辑，第11页。
- ⑯ 邵燕祥：《城市之声》，见严建平编《心中的绿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
- ⑰ 周笃文：《水调歌头·六十国庆放歌》，《光明日报》，2009年12月4日。
- ⑱ 刘玉平、周晓琳：《城市审美特征的当下思考》，《文艺争鸣》（艺术）2010年12月号下半期。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文学城市审美的历史演进”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A751030）

责任编辑 玉兰